

西方哲学分析性研究

理性的历史

徐 圻 著



沉思

贵州人民出版社

理性的历史沉思

——西方哲学分析性研究

徐 圻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唐流德

封面设计 张彪

理性的历史沉思

徐圻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1)

贵阳市大南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1/32 11.5印张 字数: 280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000

ISBN7-221-03654-3/D·137 定价: 10.00元

自序

哲学史研究者向人们提供的成果有两类。一类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编年哲学史。这种成果的好处是系统、全面，它对于把握哲学思想演变的全貌及其与社会历史环境的一般关系是有益的。但是这种研究不具有鲜明的特色，它不能从深度上刻画和剖析某一哲学运动或流派、某位或某几位哲学家甚至某种哲学见解的思想内涵及其影响。因此，那些在总体上已经了解了西方哲学发展历程的人，如果还没有失去兴趣的话，就不妨读一下另一类研究成果，即专题研究。本书就属于这种成果。

我将本书定名为《理性的历史沉思》，有两个含义：其一是对作为一种理性思考活动的哲学发展史作静态的反思，其二是对这种活动作动态的历史审视。它选取哲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运动、最主要的理论倾向、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及其最有代表性或最有争议的观点和学说，加以分析性的说明。本书中的部分内容以前曾在一些学术刊物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过，在被收入本书时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发挥；而大部分内容则是近两年来逐渐构思和完成的。我不敢说这本书的观点一定全都正确，但它们都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读者很容易发现，书中对资料的选用、理解及其导致的结论大部分都是与众不同的。因此，我本人将对可能的疏漏、不当和错误负完全的责任。

写作本书基本上是由于个人的爱好。我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工作已有十余年，开始搞研究时主要是为了辅助教学。后来，随着教学的熟练和不可避免的周而复始，研究便成了相对独立的工

作，并且引起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个情况与哲学在我国普遍遇到的情况正好相反。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哲学曾经十分辉煌过，那时它是包容万般、包医百病的一门学科或者说一种工具，稍为重要一点的事情（特别是社会政治事件）都可以被简单而决定性地归结为某种哲学上的胜利或失败。那是哲学世俗化、实用化的时期。但是近十几年来，哲学却在不断地衰落着；虽然哲学的研究和教育也曾有过断断续续的勃兴，却总的来说在走下坡路。目前哲学遭到的冷遇，常被振振有辞地解释为“哲学没用了”。的确，研究哲学与今日的时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无疑是最不能满足人的物欲的一种追求。但是哲学不是曾经也十分时髦吗？为什么哲学会有如此不同的遭遇？对此，一般的解释是，时代变了。然而我要说，不论是哲学以前的那种处处适用，还是今天的处处不适用，都是以功利主义态度去对待一个本身超功利的学科的结果，因而都是不正常的。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哲学植根于现实世界的土壤之中，但如果夸大这一点，则会削弱乃至抹煞哲学独有的规定性，其结果只能是，要么它会由于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有效工具而倍受青睐，要么它会由于不能带来经济效益而无人理采。我认为哲学的生命力一方面在于它总能高层次、高水准地展现或预示时代精神，而不是去扮演某种精神市侩；另一方面则在于总有那么一些冷静、执着的人在不懈地推进它的发展，而不理会那些来自世俗的褒扬或贬抑。苏格拉底认为哲学是追求智慧的一项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产生于人的“闲暇”，他们的意思都是说，哲学的存在和进步离不开哲学家出自个人原因的某种爱好。我不相信哲学的贫困状态会长久地持续下去，这不仅因为我们这个正在崛起的伟大民族不可能不需要那些能体现自

己的性格、灵魂和气质的精神作品，而且因为，不管社会的变化多么大，它总会为那些乐于和善于思索的人提供生存空间，使他们在淡泊中体会冲动，在流俗中达致崇高。我当然不敢与先哲们相比，但他们那种精神却是我尽量效仿的，这也正是我在今天仍然热心于这种理性沉思的主要原因。

就这本书来说，它作为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也有其特殊理由。一方面，我的专业就是西方哲学，研究起来自然比较得心应手；另一方面，与哲学原理相比，哲学史的研究较为容易，因为它的思考对象较为现成，思考空间也较为宽阔。但这并不是说它只能局限于哲学史的范围之内；读者可以看到，本书包含了一些我个人有关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一般哲学问题的见解。

要想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体现为一种能够为学术界认可或不可的东西，就必须付诸出版。这是当今任何学术研究者都不能不考虑的“非智力的因素”。对此，我要发自内心地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各级领导给予了我热忱、最有效的帮助。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良师益友卢惠龙先生。作为笔耕多年、作品丰硕的著名作家，惠龙先生对我所从事的精神劳作是完全理解的，他也是第一位阅读本书手稿并予以充分肯定和提出了有益指教的人；同时，作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他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最初的和最终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唐流德先生。他在业务和公务繁忙的情况下，欣然担任了本书的责任编辑；在整个出版过程中，我与他进行了愉快的合作。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他们以及其他关心、帮助我的人们的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读者见面的。仅仅为了这个，我也有理由、有信心继续从事我的研究工作。

徐 圻 1994.11.

目 录

自序.....	(1)
导言.....	(1)

上 篇

一、哲学唯心主义：认识的升华和扭曲.....	(13)
二、另一条哲学战线：思想与感觉的碰撞.....	(30)
三、怀疑主义：认识发展中令人不快的促进环节.....	(46)
四、古希腊哲学：一位现代哲学家的“六经注我”.....	(65)
五、现代哲学：古典哲学的否定和“超越”.....	(81)
六、直觉思维：科学发现的非逻辑手段.....	(94)
七、科学哲学：知识价值的观念转换.....	(108)
八、分析哲学：语言的澄清与哲学的进步.....	(121)
九、逻辑实证主义：“形而上学”的困惑.....	(137)
十、量子力学的哲学意义：造福人类的有效工具.....	(155)

下 篇

十一、斯宾诺莎：一位唯物论者，还是一位思辨哲学家？	(173)
十二、德谟克里特、霍布斯、洛克：感觉与对象在多大程 度上具有同一性？.....	(186)

十三、贝克莱：双重的社会身份导致双重的哲学影响·····	(205)
十四、康德：“批判哲学”的另一份遗产·····	(217)
十五、康德与黑格尔：迥然不同的两位哲学巨人·····	(234)
十六、罗素：一位自由派思想家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	(249)
十七、罗素：艺术与科学、自由与必然在历史领域中的割裂 ·····	(266)
十八、皮亚杰：初级理性的批判·····	(279)
十九、萨特：人的价值与人的激情的合一·····	(293)
二十、弗洛姆：一次有价值然而并不成功的理论综合·····	(309)
二十一、马尔库塞：物的无情挤压与人的千篇一律·····	(323)
二十二、本格：以科学的名义捍卫和充实唯物主义·····	(346)

导 言

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和信仰的原因。

——伯特兰·罗素

研究哲学的历史是一件很困难也很容易的事情。说它困难，是因为所要研究的课题事实上是不能明确划定范围的；不仅对于哲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关系的流行看法随着时间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而且在每一特定时期，那些被称为哲学家的人们所探究的目的和方法也有着很大的差异。说它很容易，是因为如果有效地用一两个统一的尺度去为纷繁复杂的哲学思想归类，那么我们就只须给它们贴上不同的标签就行了，剩下的工作只是在于证明或争辩这种标签的适宜程度。不论是困难还是容易，结果都是导致人们认为研究哲学史是不值得的，因为过于不一致的研究和过于一致的研究似乎都有失严肃性和普遍性。这种批评对于后一种研究即贴标签式的研究无疑是正确的，而这种研究又的确曾十分流行过，以至于从标签式研究发展为漫画式研究——那已经不是研究了。但是，今天的西方哲学史著作特别是教科书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简单化的研究方法，仍然在寻求一种规范化或导致一种既定的哲学归宿。当然，如果这种规范化或归宿的

确是历史上特定的哲学流派、特定的哲学家本身具有的或打算具有的，那不仅无可非议，反而是一种有价值的发现。问题在于，有许多结论不是从思想史的实际中概括出来的，而是从某种甚至与哲学无关的论断中演绎出来的，这当然难以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勿宁说裁剪——哲学史肯定是很容易的，唯一的困难只在于裁剪者如何做到不要与其他人所做过的工作过于雷同。

然而，因为研究人类认识发展的历程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断言它不值得做，却是错误的。因为哲学是一种符合人的本性的活动，而哲学史则记载和总结了这种活动。如果说求知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的话，那么追根究底地求知就更体现了人类的高贵。罗素曾把哲学定义为某种介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东西，他的意思是，人具有这样一种自然倾向：追求尽真尽善尽美的东西，这种追求便是哲学。哲学像宗教一样，力图占领那些最普遍、最深刻而又无法被确切地证明的领域，以便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找到立足点；但是哲学又像科学一样，宁肯诉诸于人的理性而不愿诉诸于权威，不管是人的权威还是神的权威，它总是打算对它涉及到的事物予以尽可能确切的说明。但是哲学的追求又在本性上不同于宗教和科学。它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尤指所谓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感兴趣也不能回答的问题；神学虽然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但它信心百倍地给出的答案，又是哲学所不取的（中世纪经院哲学除外）。哲学就处在介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这片无人地带。它不断地受到双方的攻击。来自宗教的攻击主要是在近代，当时的神学家不愿看到信仰统治理性的局面土崩瓦解；来自科学的攻击主要是在现代，科学的辉煌成就使人

觉得哲学已经多余。但是哲学仍然存在着、发展着、进步着，它不仅使某些宗教问题变成了哲学问题（如从对宇宙的起源和动力的神学编造变成了理性说明），而且使某些哲学问题变成了科学问题（如形而上学的原子论转换成了物理学的微粒说），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智力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善而进步。

哲学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每一特定时代造成了影响的哲学思想，总能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的土壤里找到最深刻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哲学的历史，也就是研究人类文明史上最闪光的部分。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就应当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就应当了解它的哲学史。这不仅对于以研究哲学史为专业的人来说是这样，而且对于那些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对哲学史发生兴趣的业余读者来说也是这样。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巨大的作用，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从古希腊到今天一直不曾停息过的交互作用就构成了哲学史或人类文明史的主题。

从个人的角度讲，哲学的发展和对这种发展的反思也是有益的。在希望与恐惧之间徘徊是很令人不安的一件事情，然而这却是独属于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的一种心理状态。我们的希望常常是建立在那些我们已经知道或注定会知道的事情上面的，而我们的恐惧则总是与我们的无知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当我们对自己无知的程度也无知时，我们的恐惧尤甚。哲学可以有效地缓解我们这种不知所措的心情。凡是我們能够知道的事情，科学都会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事情是很少的；另一方面，宗教或神

学却带给人们一种武断的信念，说我们对于事实上我们是无知的事情具有知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傲慢，它对人的慰藉只是暂时的，它的效果就像人刚听完神话故事时那种片刻的欢愉一样。哲学的功能在于，它虽然不会像科学那样向我们提供确切可靠的知识，却可以告诉我们有哪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同时消除由于宗教的说教而带给人们的自欺欺人或麻木不仁。使得人们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恐惧、盲从所困扰，这也许就是哲学自产生以来一直卓有成效地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所在。既然如此，了解历史上的哲学家怎样提出他们的学说而又怎样更换他们的学说，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

哲学史与科学史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前者体现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而后者则除了革命时期以外，常常是平静的和按部就班的。很少有科学家会在生前获得显赫的思想和政治垄断地位，但他们也一般不会遭受牢狱之灾。哲学家却恰恰相反，“哲学王”不仅是柏拉图的一种政治理想，也是后来的某些政治现实（如罗马皇帝奥勒留），至于其哲学被命名为官方思想的哲学家，那更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哲学家也会因其理论见解的“不当”而轻则隐姓埋名，重则身陷囹圄。这是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造成的，这也说明了把握哲学与其社会背景的关系的重要性。但是这不应客观地说明和理解哲学思想的演化造成太大的妨碍，甚至可以说，这种情况反而应当使我们更清醒地注意到客观性问题。科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技术仪器一样，工作了一个时期之后就要被取代，这个过程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被普遍认可的。哲学理论的更替则不然。它受到的制约因素太多，以至于好多年以后也有时不清楚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非自然的。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宁可承认哲学家之间的取代具有理论的合法性，而是去分析取代的具体方式。一个人尽可以坚持说，某一位哲学家与另一位哲学家在某个问题上的争论是对的或错的，但这种说法并不能剥夺那位被认定为错了的哲学家向历史述说其见解的权利。一个人完全可以在充分理解莱布尼茨对洛克的批评时仍然赞成洛克，反之亦然。重要的不是哲学思想的争论及其胜负，而是各种哲学思想在争论中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或预示了行将到来的时代精神。

应当承认，巴门尼德、普罗泰戈拉、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提出的那些问题，直到今天还不能说得到了完备的解答，实际上有许多问题现在仍然是争论不休的。这肯定是现代人厌倦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断言那些问题已经在某个时候获得了一劳永逸的解答，其后果将更糟，那意味着人类文明史的终结。因为如前所述，围绕哲学问题所进行的争论与人类文明的进展是休戚与共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为古代的哲学问题依然存在而惊奇，相反，我们应当回到那哲学的萌芽时期，从那里开始对人类理论思维的结晶作一番批判性的考察。

伟大的黑格尔把哲学的发展看成一种类似胚胎生长发育那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点是潜在的，终点是展开的起点。我认为除了他的“终点”这个说法过于陈腐外，他的整个想法是站得住脚的。因此，起点如何向开放的将来展现，乃是哲学史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我已经指出，为尽可能客观地了解哲学史，最好不要对争论着的派别、倾向以及哲学家采取教条的态度。如果这种要求是正当的，那么首先，我们在总体上把握哲学

史时应当着眼于认识的深化与净化，随即会发现，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一种自然心理现象，因为它植根于素朴实在论或人们的常识；而唯心主义的出现却是主体自觉地把观念的世界或感觉的世界从现实中抽象、分离出去的结果；唯心主义的发展更能体现人类认识的进化规律，尽管世界的二重化本身是一种歪曲。此外，与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相并列，还有一条并非隐蔽的哲学战线，即唯实论与唯名论（或思辨哲学与经验哲学）之间的争论。这场争论起自希腊，终于现代，其结果是，一方面唯名论的现代变种实证主义统治了英语国家的哲学论坛，另一方面，思辨的形而上学在欧洲大陆穿上了浪漫主义的外衣。

从西方哲学的幼年时代起，就有那么一些非主流的哲学家专门从事发现和揭露智慧大堤的漏洞的工作，他们以批判和怀疑的眼光对待逐渐丰足的知识仓库和不断增长的人类自信心，从而构成了认识之网上的一个个否定环节。怀疑主义以消极的方式向人的理智提出了要求，迫使哲学家们为满足这些看似过高的要求而从事新的建设性工作。但是在卡尔·波普尔看来，批判或怀疑绝非怀疑主义者的专利，而是一种至少贯穿于希腊哲学的原则，它成为使正统的学派内部和学派之间得以承前启后的积极环节。

哲学在走过了二千多年的曲折道路而进入19世纪后半叶时，其内部发生了空前的反叛。探究宇宙、人、人的思想的最终意义，向来是哲学的独有使命，可是在当代一批受到逻辑学和科学成就熏陶的以说英语为主的哲学家眼里，这种使命却成了妄想。他们力图通过语言分析来宣判传统哲学的死刑，并通过同样的手段来宣告“新哲学”的诞生。这种新哲学只能尾随在实证科学甚至常识之后，去澄清它们可能出现的语言误用，而根本不能告诉人

们如何解释这个世界，更不能告诉人们如何去生活。在另一方面，主要生活在有思辨传统的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却用自己的方式来改造传统哲学。他们认为，告诉人们如何去生活不仅仍然是哲学的任务，而且应当是首要的任务。但他们并不打算发展某种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或价值哲学，而是要建立某种围绕着人展开思辨的形而上学，其中，人的某些非理性的心理状态乃是这类形而上学的根基。

尽管现代哲学的这种离经叛道漏洞百出，却至少在两个方面体现出积极的意义。首先，注重语言的传达和交流本是哲学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要求，而且传统哲学中的确不乏因概念术语的滥用、误用而引起的混乱，加之现代科学对概念、陈述的简明性和精确性的要求，这都是现代哲学中的分析运动产生、流行的理由，而且它也的确澄清了一些悠久的哲学争论；特别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思想上的繁琐习惯，使之更加经济和有效。其次，以人为哲学关注的中心，体现了人们对后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主体（特别是主体中受到忽视乃至压抑的那些组成部分）在揭示宇宙的原因和预言宇宙的结果中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受到了这些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的真正重视，而传统哲学的一个缺陷恰恰是不愿意承认感觉和思维之外的精神现象有任何认识论的价值。这无论如何反映了人类知识增长的客观要求，因为比如直觉早在近代科学中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现代几乎所有伟大科学家的业绩中，也都能挥找到它。

20世纪是自然科学空前介入人类事务的时代，科学理论通过有组织的技术实施，变成无数精巧或庞大、便宜或昂贵、与日常

生活关系密切或不密切的装置，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对科学进行哲学的反思，是20世纪哲学的一大特点，不论在理想主义的欧洲，还是在实用主义的英美，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欧洲人关注的是科学造成的影响，他们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影响，目的是消除这种影响所带给人的心理损伤，进而在人与科学技术之间保持平衡与和谐。英国人和美国人关注的则是科学本身，他们对待科学（包括其影响）的态度是积极的、肯定性的。他们的这种关注及其乐观态度使得“科学哲学”这门新兴的哲学分支得以形成、发展、壮大。尽管科学哲学经历了逻辑主义（或证实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这几个阶段，但我认为核心的问题乃是对科学的意义或价值作何评判的问题，而上述阶段无非体现了科学价值观的转换。但是一旦进入原则上不可观察的领域（如微观世界和与光速可比的运动状态），科学理论便与其说是一种描述，不如说是一种猜测；主体在构造这类理论过程中的作用往往具有决定意义，而这类理论的价值则与其说它提供了一种真理，不如说提供了一种能够有效地造福人类（或毁灭人类）的工具。

毫无疑问，与其他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一样，哲学史最吸引人的也是它的主体——哲学家。对哲学家的描述、解释和评价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如他们的学说之间的继承与批判、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历程等等。大致看来，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描述和解释。一种来自以哲学史为专业的作者，他们的记载尽管不可能完全摆脱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他们自己的倾向的影响，却不失客观性；另一种来自哲学家。哲学家对他们的先辈和同行总报着一种实用的或挑剔的态度，他们撰写哲学家的传记是为了印证他们自

己所持观点的合理性以及反驳他们并不喜欢的哲学家及其见解，尽管他们一再让读者相信，他们是在作客观描述。这样的记载是很少有客观性的，因此，那些有兴趣阅读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罗素写的哲学史或哲学家传记的人，一定要以某种保留和警惕的心情来对待展现在面前的哲学思想历程。但是，要做到完全客观的公正毕竟是很难的，特别是当大多数人已习惯于对重要哲学家的固定评价时，就尤其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理性的和批判的态度是十分要要的，这种态度的要点是，冷静地看待和思考历史上哲学家的尽可能完整的思想发展轨迹，对所有既定的评论（包括权威的评论）都不盲从。

如果持这种态度，则会发现有许多流行的关于哲学家学说性质、学说影响和学说地位的评价并非定论。比如作为笛卡儿的思想继承人和莱布尼茨的思想导师的斯宾诺莎，怎么可能在认识论上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呢？这就有必要重估他的本体论。又如，哲学史上关于感觉对象的所谓“第二性质”的学说，向来是被从消极的方面予以评价的。而事实上，这类学说不仅体现了人类对自己的感觉及其与对象的关系的一种可贵探索，而且它本身与科学的结论也是大部分吻合的。再如，贝克莱可以称得上最声名狼籍的哲学家了，惟其如此，就更应追究一下，这样一个哲学狂人何以保持了那么深远的影响（假定受他影响的近现代哲学家并非狂人）？

在我看来，伊曼努尔·康德是所有西方哲学家中最具魅力也最值得研究的一位。他的直接影响已持续两个世纪，而且这种影响在许多方面都已开花结果。那么，什么是驱使康德从事他的“批判”的根本动因呢？另外，黑格尔被普遍确认为将康德发起